



第十三期

鄞縣新四軍研究會會刊

譚在龍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 297.3-55
470/V13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主办

1998 年第二期

(总第十三期)

目 录

★纪念改革开放 20 周年

鄞县改革开放与发展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 张完成(1)

鄞县乡镇企业的崛起 严伟祥(5)

★战斗回忆

记陈书荏支持抗日四件事 马立祥(9)

连天爆竹声 邵兴健(11)

坚持四明解放斗争的回忆 鲍纯甫(12)

在山心的日子里 项 耿(21)

五双不同鞋子走过的路 项 耿(32)

武装保卫秋征 杨祥瑞(35)

忆四明山修枪所建立前后 周光华(38)

上古山脱险记 崔 瑛(40)

★军史研究

永安整风与四明地区解放战争 鲁 刚(41)

★缅怀先烈

泰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缅怀先烈 林大章(43)

★老区建设

浙东抗日民主俱乐部修复 张完成(44)

新蕾走出困境再展雄风 鲁 刚(45)

★会务活动

宁波各县市区新四军研究会联谊会

在鄞县召开	鲁 刚(47)
在宁波各县市区新四军研究会第五次联谊会上讲话	朱禹宝(48)
1998 年会务工作回顾和 1999 年会务工作初步意见	王雅根(50)
在黄泉水等老战士祝寿座谈会上讲话	王雅根(53)

★民歌、诗

抗日民歌四首	翁绍初(54)
颂新四军	许祖安(58)

★简讯	秘书组(8)
-----------	--------

编辑:鄞县新四军研究会秘书组

责任编辑:鲁刚 审稿:张宪成

宁波新华印刷厂印刷:1998 年 12 月付印

鄞县改革开放与发展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

★ 张宪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20 年中,中共鄞县县委和县政府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和“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在各个阶段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为纪念具有历史里程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坚持“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很有必要:回顾历史以增强信心,总结经验以继续开拓,吸取教训以免走弯路。

一、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重申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延安整风以来一次范围较广泛、影响较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实现历史性转折作了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现全面的拨乱反正,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把生产力标准提到第一位。

为解决“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精神枷锁等普遍的精神状态,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经过讨论,破除迷信,解

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促进了全县党政干部和人民的思想解放,使人们的思想逐步活跃起来、振作起来,勇于实践、大胆试验,有力地推动各条战线的整顿,推动了改革开放。

1979 年 1 月上旬,县委常委组织学习讨论,并作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习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活动。在学习基础上,于 2 月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讨论鄞县工作重点转移,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加快鄞县农业发展步伐。之后,突出贯彻落实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接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 1966 年至 1978 年判处的各类刑事案件 1304 件进行了复查;对“文革”中受审查的干部 1114 人复查,落实政策 1100 人;对群众的冤假错案 1598 人,平反 1438 人;对错划右派进行了平反改正;共摘地富帽子 4514 人。进一步落实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党的侨务政策等。从而,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把精力集中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鄞县。之后,不断解放思想,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三个有利于”根本判断标准,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

二、农村起步，改革不断深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提出了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权利；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为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为尊重广大农民的创造精神，在全国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县委为探索社会主义新时期如何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面调动农村各业劳动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总结推广邱隘公社（镇）水稻田间管理实行包工到组到人。验收拨工责任制。次年，建立各种形式联产计酬责任制（三包奖赔、牧场联产承包、种植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1982年，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建立林业“三定”发证等管理制度。

1983年，县委总结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现传统农业向规模农业、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战略转移。推行“双田制”，实行双层经营。1984年率先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培植农业承包大户。邱隘镇邱二等村试办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机化栽培技术、社会化服务三配套的家庭农场。1985年，农村全面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之后，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正确理解了“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坚持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使粮食稳定增长。从而，在“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土地日益向种田能手集中，出现种粮大户，“三配套”（农业机械化、高产栽培技术和社会

化服务）家庭农场、联户农场和集体农场等经营形式；形成村为基础、镇乡为骨干、县为依托，各种专业协会为补充的社会服务网络。姜山镇卢方兴，从1988年承包63亩土地开始，目前承包耕田达405亩。他说，规模经营出效益，科学种田尝甜头。1996年，他推广轻型栽培技术118亩，1997年扩大到260亩，成为鄞县推广水稻轻型栽培技术第一大户。

1987年，村、镇乡建立农业发展基金，次年，建立规模化的县、区、镇乡三级农业发展基金，筹资1816万元，促进了农业水利建设和农机化推广。1991年，县委、县政府作出“科技兴农”的决定，至次年，各镇乡配备了专兼职科技助理，并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10所大专院校、10所科研单位建立了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由高级专家和高中级科技人员组成的县政府顾问团和县科技咨询委员会，形成了农村推广服务网络，一批适用农业技术大面积应用，提高了粮食和水果的良种覆盖率。1992年，名列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第19位。1993年，县委九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全县农村奔小康的决定》，争取1997年提前实现。1995年12月，省政府公布鄞县为全省首批小康县。

接着，全县各地以“巩固、完善、提高、发展”为宗旨，不断改善规模经营管理工作，镇村两级建立承包大户档案，采取动态管理的方法，对原大户定期进行考核筛选，优胜劣汰，对新增大户普遍实行公开招标，择优选招，推行“绿色证书”制度，加强对大户培训，提高大户的素质和经营水平。从根本上保证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有利于良种引进和先进的农业适用技术推广应用。1997年，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有了新发展，有10亩以上种粮大户8495户，多种经营大户6618户，形成一村一品”专业特色村212个。

三、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鄞县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断开拓创新，经历了改革、发展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阶段。改革自农村起步，逐步深入，并扩展到城镇改革。

1992年春,中央发表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县委县政府领导统一认识,确立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高起点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新格局的战略,提出“三外齐抓、三外齐上、三外联动”的工作方针。加强了对梅墟工业区的开发建设,确定邱隘镇为综合改革试验区,探索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实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全面发展的新路子。6月20日,县委县政府作出《关于科教兴县的决定》,8月24日,作出《关于实施科教兴县决定的若干规定》共40条,经全面发动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工作,全县形成了重科技、想科技、抓科技的共识和活力;并大力开展引进各类人才。

1994年1月,县委召开九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动员全县上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加快改革,努力夺取两个文明建设新胜利,尽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接轨;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农业基础,出台了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稳定和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坚定不移发展“一优二高”农业;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方针,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等10条意见。同时,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全面推行股份合作经济等各种形式的经营机制的改革,鼓励和支持个私企业发展,出台了有关政策和措施,有效地增强了企业活力,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县委举办了4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领导干部理论培训班,全县300余名县管干部参加了学习。组织干部职工实施“科教兴县”发展战略,开展科技十佳企业、十佳科技工作者和引进、使用、培养人才的十佳“伯乐”等科技三“十佳”活动。组织“星火”、“燎原”、“火炬”、“丰收”等科技计划的实施,并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科技进步年”,争创强村、强厂、强镇活动。促进了一批基础好、实力强的各行各业“龙头”企业上水平、上规模、上台阶,涌现了“杉杉”、“雅戈尔”、“华茂”等一批“巨人型”企业,达

到“科教兴县”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1995年,国家科委命名鄞县为“全县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

1997年,全县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6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15亿元,比1978年的4.62亿元、2.67亿元年平均递增22.4%、15.4%;农民年均纯收入1997年达4993元,比1984年的561.02元年平均增长5.46%。

四、加强文明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复查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政策,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一是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五好家庭、文明墙门活动,建设文明村、文明镇、文明单位。提出了五抓五变要求:抓思想教育,治旧变新;抓文化教育,治愚变智;抓社会治安,治乱变安;抓环境卫生,治脏变净;抓生产发展,治穷变富。二是开展理想和纪律教育。在青年中开展“学英雄,树理想,比贡献活动”,在妇女中开展“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做到四个结合:教育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教育与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相结合;教育与端正各部门的业务指导思想和做好本职工作相结合;教育与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相结合。三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举办法制学习班,进行“九法一例”学习和“二五”、“三五”普法教育,实施以法治县。四是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是一项纳百川于江海的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年年搞“路教”,年年新内容,结合实际有新主题。五是开展爱国主义系列教育。如:知我鄞县,爱我鄞县,兴我鄞县的系列活动;实施优秀鄞县人工程;奉献于事业,服务于人民的系列活动和艰苦创业教育系列活动等。评选县精神文明建设十件新事,公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基地作用,教育青少年、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干部。

总之,鄞县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既有理想、纪律、爱国主义等思想道德教育,又有扶贫结对以富帮贫,希望工程等务实的行动,以“团结、创新、务实、争先”的鄞县精神为动力,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根据中央对干部“四化”的要求,县委县政府重视培养和选拔年富力强的干部。在整顿公社领导班子中,围绕四化建设统一思想认识,按照四化要求选拔干部,以老带新,切实搞好传、帮、带;妥善安排年轻干部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积极稳妥地选拔中青年干部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选调苗子到各级党校培训,或到单位挂职锻炼,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工作处事能力。80年代以来,县委党校举办了各类短训班、培训班、学习文化、学习理论,促进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其中,五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181名学员中,走上高一级领导岗位的占65%。学历培训班,仅四届函授大专班的197名毕业学员中,担任处级领导的2名,任局级干部的44名,任科级干部61名,任厂长经理及校长的30名,占总数70%。

五、成果与启示

在改革开放20年中,鄞县坚持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1984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1988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18.68亿元,比1980年3.781亿元提前12年实现了翻两番;1995年,省政府公布鄞县为省首批小康县。

自1986年起,鄞县先后获得全国农村改水工作先进县、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绿化造林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初级卫生保健达标先进县、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先进县、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县、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等称号。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美好未来仍需创造且任重道远,更需尽力奋斗。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更要冷静思考。其启示有:

1、必须树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观念。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本地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根据不同阶段的形势要求,研究确定相应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路子。

2、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审时度势,把握发展主动权。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要紧紧紧抓住各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机遇,抢先一拍,领先一步;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善于变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解决好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

3、坚持两手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在实践中,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整体统一部署,统一安排,以提高全民素质和镇村文明程度为着眼点,重抓基层,整体推进,坚持科教兴县、依法治县,逐步形成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4、坚持围绕经济抓党建,努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和本地实际,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为目标,抓教育,抓管理,强班子,强素质,保证两个文明建设顺利进行。

5、抓关键,加强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运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献计献策、尽责尽力。

改革开放20年看鄞县乡镇企业的崛起

★ 严伟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鄞县的乡镇企业打碎了束缚的政治枷锁,各级干部和群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加快乡镇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通过横向联营协作、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企业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树强扶优战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大批优势骨干企业纷纷崛起,名牌产品不断涌现,支柱产业基本形成,整体素质和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实力得到了较快的递增,初步实现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改革开放前的鄞县乡镇企业

鄞县乡镇企业的发源可追溯到农业合作社时期。县委、县政府根据“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和“为农业生产、为工业、为城乡人民生活 and 外贸出口服务”的生产经营方针,把“五匠”和“四坊”组织起来,从事副业生产,形成了社办企业的雏型。至1958年底,全县有社办企业121家,职工13621人,产值511万元,由于资金、技术、交通等原因,大多数社办小厂在60年代被迫停产。六七十年代发展了一批小化肥、小水泥、小五金等地方“五小”工业。1975年12月,县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后改为乡镇企业局)。1978年,全县社队企业已有1764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工业产值达到2.8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9%。

当时乡镇企业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企业的总体规模小、发展缓慢,基本上处于“小打小闹”作坊式的格局。二是工艺水平低,产品质量差,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生产方式,机械设备简易、生产效率不高,行业门类发展比较单一,以机械五金、建筑业为主。三是企业生产发展不稳定,政治斗争冲击大,出现时开时关的生产局面。该时

期的工业经济尽管有诸多弊端或缺陷,但为以后乡镇企业的兴起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骨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后鄞县乡镇企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鄞县的领导班子,解放思想,灵活运用党的政策,紧紧抓住改革机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扶持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全县的社队企业如沐春风,茁壮成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县革委会指示县级机关各部门和各区、社兴办各类企业,同时提出“粮钱人一起抓、农工副齐发展”的方针,并出台有关优惠政策。社办企业的经营方针由面向农村、农业、农民逐步转为面向市场,并引导全县乡镇企业按社会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发展小批量、多品种、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填补市场空缺。

80年代起,社办企业开始重视技术改造。1982年,在科技部门协助下,先后试制成功汽车节油器、印刷号码机等80多种新产品。其中福明船厂生产的密封式救生艇、塘溪农机厂生产的液化氯沸水器、姜山天平仪器厂生产的TA328B光学读数分析天平等产品填补了国内和省内的空白,使不少企业领导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人才是发展企业的重要资源,开始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络。至1983年,全县已有200余家骨干社办工业企业设立了技术课,有90个社办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外聘工程师以上的兼职顾问75名。

1980年6月,各区成立工业办公室。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全县社队企业实行定人员、定产量和产值、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利润、定消耗,在超额利润中提取企业奖励的经济责任制。此后,全县社办企业推行利润包

干、超额奖励的承包责任制;并兴办联户和个私企业。至1983年,全县共有2462家社办企业,产值6.2亿元,分别居全省和全国县级社队工业第2位和第13位。

三、乡镇企业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

1984年,县委、县政府确立乡镇企业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产业地位由“农工副”改为“工副农”,经营方针由“三就”转为“着眼于农村致富,发挥各自优势,立足市场调节,积极外引内联”和“按照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产品方向”,出台了《关于加强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等文件。鼓励乡镇企业与外地企业开展横向联营。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少企业生产业务普遍紧缺,各企业厂长充分调动供销人员的积极性,各显神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通过走南闯北、外引内联,使鄞县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6年起,县委、县政府和乡镇企业局积极引导企业与大中城市开展多种形式的横向联营。首先与上海、杭州等地的大、中型企业以资金、技术、原料乃至市场销售等方式,实行了各种以互惠互利为原则的横向联合。其次,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对横向联营企业给予有力的倾斜支持,鼓励企业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引进信息、资金、人才、技术等。再次,在企业利润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利益,保证企业有发展再生产的充足后劲。通过联合、联营、开展协作生产,乡镇企业各取所长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逐步形成一批上规模、上等级、上水平的骨干企业。如沪江电扇厂、岐阳电讯元件厂、鄞县水表厂等企业成为行业门类中的“龙头”,起到示范和导向作用,带动了一大批企业的发展。1988年全县乡镇联营企业发展到580家,引进资金9540万元,技术人员894名。

改革开放十年间,开展各种形式的横向协作,鄞县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初步打下了县域工业经济的基础。1988年,乡镇企业发展到13568家;从业人员22.8万人;产值达36.2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81.7%;上交税金占全县财政收入的60%,成为县域经

济的主体。

四、调整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鄞县从实际出发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出口创汇。1986年,全县外贸收购额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

次年初,根据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县委、县政府组织“四套班子”领导和主管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赴珠江三角洲学习考察,形成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振兴鄞县经济的必由之路的共识,确立了经济工作的外向带动战略。接着,县委、县政府制订出台了《关于扩大出口创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政策。对出口创汇企业在原材料、电力、资金供应等五方面实行优先,对内贸转外贸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支持,并建立了出口产品生产发展基金。全县上下掀起了一轮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热潮,外贸出口迅速发展,1988年自营出口额43万美元,实现了建国以来首次自营出口。

县委、县政府为提高出口产品的创汇能力和档次,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1990年明确提出了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外资引进为突破口,再造鄞县乡镇企业行业、产品优势的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出口创汇的优惠政策,同时设立对外展示窗口和举办促销活动。1990年和1997年分别在广州和深圳举办了鄞县出口商品展销会。1992年县政府在深圳、北京、天津设立办事处,从而使全县乡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引进和利用外资有重大突破。是年,新批三资企业105家,投资总额1.2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3604.4美元,全县外贸生产企业达到400家,出口商品收购额13.87亿元,比1989年增长3.4倍。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1993年县委确立了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高起点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新格局的战略,提出“三外齐抓、三外齐上、三外联动”的工作方针。走外向型道路。首先,立足外贸、

主攻外贸,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向外拓展。1993年4月,县进出口公司第一次参加广交会,接待外商200余人,签订自营出口合同1168万美元。11月,县政府第一次组团到日本大阪举行经济展示会,随后在1994、1995年赴德国汉堡、美国洛杉矶举办大型经济贸易洽谈会。1995年全县外贸收购值58.9亿元,比1990年增长12.8倍,自营进出口额2.14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41.1倍。

同时,外贸出口实施了树强扶优、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出口规模、结构优势充分发挥。1997年底,雅戈尔集团等生产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全县出口产品已覆盖95个国家和地区;宁波三星集团等5家出口创汇龙头企业,成为鄞县出口创汇的主力军,对全县外向型经济发展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该年全县乡镇外贸出口交货额和自营出口额分别达58.18亿元人民币和1.25亿美元,均居全省前茅。实际利用外资3.76亿美元,引资规模居全市各县(市)首位。成为全国第五家全省第一家拥有外经权的县(市)。

五、加强技改投资,树立争创名牌、抢占市场意识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鄞县召开了全县加快改革开放动员大会,确立了“大投入、大发展、大提高”的基本思路,提出建设一批上规模、高起点、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开发一批高档次、高水平的新产品。县委、县政府决定在继续扶持骨干企业的基础上,实施以培育十大明星企业、十大名牌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双十工程”,要求其在全国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创出自己的品牌。县里集中财力给予了重点倾斜,不搞终身制,每年评定一次。从而激发了企业技改的积极性,树立了争创名牌、抢占市场的意识,取得了显著成果。宁波青春服装厂自1990年8月与澳门南光国际贸易公司组建中外合资宁波雅戈尔制衣公司后,以成为中国的皮尔·卡丹为目标,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从日、德、美等国引进了300多套最新的一流设备,使雅戈尔高档衬衫逐渐走向全国。1994年,雅

戈尔衬衫在全国衬衫行业评选中独占鳌头,成为中国第一名牌衬衫。“双十工程”的实施,带动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名牌的争创,至1994年三年中,全县共实施技改项目达1353项,总投资达23.6亿元,还开发市级以上新产品613只。

1995年起,为增强全县综合实力和发展的后劲,鄞县实施了“强厂工程”,提出争取三年内形成一批厂长素质好、产品档次优、管理水平高、整体实力强、发展前途大的重点企业,成为全国有地位、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对区域经济有支撑和带动作用的“巨人型”企业,促进了一批基础好、实力强的各行各业“龙头”企业尽快上水平、上规模、上台阶。雅戈尔集团在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第一名牌衬衫后,邀请全国资深学丰的专家对其企业发展战略进行论证,提出了雅戈尔第二次创业发展战略,也全面导入了CI,开始向多元化民营跨国集团迈进。华茂集团立足文教用品生产和市场拓展,其“七色花”系列教育用具在全国市场占有率逐步上升,到1997年底达到了76%,集团公司总资产达到6亿元,名列全国1000家“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第42位,经济效益第16位。雅戈尔、华茂二家强势企业先后成为宁波市实力工程企业,1997年,二家企业的产、销、利达到28.15亿元、29.71亿元、3.12亿元,占全县总额的8%、12%、20%。此外,三星集团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开始崭露头角,浙东水泥制品厂第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1997年有13个镇(乡)工业产值超10亿元,占全县镇(乡)数的54.2%。其中邱隘、高桥超30亿;石矸、古林、五乡、姜山、钟公庙超20亿;下应、横街、集仕港、东吴、东钱湖、龙观乡超10亿。雅戈尔等30家企业被评为1997年度宁波市明星乡镇企业;李如成等20名厂长(经理)被评为1997年度宁波市优秀乡镇企业家。

在重点骨干企业的支撑和带动下,鄞县的乡镇企业以服装、机电、轻工为主干的行业格局基本形成。涌现了一批雅戈尔、洛兹等全国著名品牌和培罗成、诺布尔、草原皇等省市名牌,加上县属企业的杉杉、布利杰、威达等,使鄞县成为全国名牌服装生产大县;以三星集团、宁波欣达电机

厂、宁波汽车软轴软管厂、宁立塑料电器公司为代表的机电业占全县工业比重达到 33%，全县有 20 余只机电产品生产技术达到或接近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有三星牌电度表、向阳牌电讯元件、欣达牌电梯曳引机、鹏程牌汽车操作索总成、沪江牌半导体塑料引线框架等。走出了一条小而精、小而专、小而新、小而特的发展路子。

综观改革开放 20 年来鄞县乡镇企业发展的足迹，充分显示出鄞县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索适合本县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开拓进取

并取得显著成绩的现实。1995 年，鄞县名列第三届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 18 位，浙江省内位居第三。1997 年，全县工业经济实现增加值 75.1 亿元，销售额 350 亿元；对外开放水平上了新的台阶，初步显现了经济强县的形象和风采。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下，鄞县各级干部和群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继续开展树强扶优，大力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县而努力奋斗。

简 讯

一、10 月 23 日，县新四军研究会假座县检察院会议室，为黄泉水(原县检察长)、王顺标(县粮食局)两位会员举行 80 岁祝寿座谈。会长王雅根、副会长王元兴、县检察院郑德兵检察长、县粮食局崔建奋副局长等参加座谈，并致祝寿词等。县新研会向两位老会员赠送了“寿礼”。会后，在县检察院食堂就餐，同该院离退休老同志一起欢度老人节。

二、鄞县新四军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1998 年 12 月 23 日在革命老区鄞江镇新蕾集团公司召开。会议由张旦副会长主持，新蕾集团公司总裁、县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刘贵祥对理事会到新蕾开会表示欢迎，并向与会理事介绍新蕾创业经验、受挫教训和重整旗鼓，渡过难关，再创雄风的壮志。王雅根会长在会上作 1998 年会务情况和 1999 年工作计划报告。会议对新蕾集团公司十年艰苦创业和接受教训，发扬革命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重整旗鼓，渡过困难，再展雄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的精神表示敬佩，并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会议讨论和审议了王雅根会长的报告，一致通过。1999 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50 年周年，又是鄞县解放的 50 周年。为了庆祝 2 个 50 周年大庆，会议决定征集编辑出版《纪念建国 50 周年》和《解放 50 周年》等专辑。召开爱国主义、革命优良传统宣讲团会议，部署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会员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和宣传工作。进行评选优秀理事，经过理事的评选：王雅根、张宪成、唐根庆、徐万茂、鲁刚评为优秀理事，同时提名的有杨祥瑞、张裕林等八位同志，理事们还参观了它山堰和太平洋 CDC 电缆有限公司。

秘书组

陈书荏先生，鄞县古林镇百郎村人，是鄞县的著名爱国进步人士，省立第四师范毕业，化学、物理造诣深。曾参加北伐，后从事教育事业。他热爱祖国，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持中共鄞县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一如既往支持党的革命事业。这里介绍的陈书荏支持抗日的事略是马立群写的陈书荏事略中选出来的。

一、建立红色庇护所——宝岩寺农场

为了解决每年购买师生 400 多人粮食困难(粮价日涨粮店有意囤积)，同时为建立学农基地，在鄞西梅园乡宝岩寺建立宝岩农场，聘请金适畅(金如山、中共地下党员、后任鄞县县委委员)主持农场事务。金如山以农场为基地，在县委书记秦加林、寿文魁领导下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吸收很多积极分子入党，其中如陈庆章(陈鸣治系陈书荏堂兄弟)严培远、邵一萍等，在以后革命斗争中均作出重大贡献。严培远、陈晓云烈士在斗争中被郭青白部杀害。这些情况陈书荏都十分清楚，他进行掩护，还给予工作方便。

二、宣传抗日，支持壮大革命武装。

抗日战争爆发，敌人步步紧迫，国难当头，同仇敌忾，鄞西地区宣传抗日活动蓬勃展开，宝岩农场利用自己铜鼓乐队，组织周围有关人士成立宣传队，赴各乡、村宣传演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激发人民抗战热情，在群众中起到良好作用。

1941 年 4 月宁波沦陷，佛教孤儿院大部迁到宝岩农场。当时国民党七区区长郭青白，收集散兵游勇，成立了“鄞西自卫游击大队”自任队长，宁波地区国民党专员俞济民给予番号，进行“游吃”。向各乡群众征收粮食(叫做派谷)，四处

搜刮、扰民。地下党为了掌握自己武装，派林一新等打入该大队，林任政训组长，严培远、邵一萍分别任蟹蛟乡、梅园乡乡队附。1942 年 2 月，林一新在郭青白处争得“警卫分队”番号，7 月发展为中队，林任中队长，浙东游击纵队派员加强力量。但经济上相当困难，陈书荏按党的意图向郭青白建议，会同地方群众代表，在梅园乡祖庙召开会议，协商派谷分配办法，陈书江、马生成等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了会议，为党的武装队伍争得分额，壮大了自己武装。

三、筹设黄古林补习中学 协助培养开辟根据地干部

1941 年 12 月，借郭青白名义成立“三青团鄞西区队”，郭青白任区队长，林一新任区队附，陈书荏应林一新邀请，以三青团鄞西区队出面，筹设黄古林补习中学。宁波沦陷后，城区各中学大都内迁，有的解散，爱国青年不愿在沦陷区接受奴化教育，纷纷逃往宁海等地入学。但不少学生受条件限制，无法去内地求学，尤其是鄞西地区同学，都要求来黄古林入学、报名，十分踊跃。1942 年 2 月，补习中学在黄古林施家十房祠堂正式开学。聘请不少原宁波各中学教师，担任教职工，这所补习中学，实是中共鄞县地下党为培养开辟敌后根据地干部学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四、冒险为浙东游击纵队送去 军用电台器材

1942 年 7 月，金如山奉调去三北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总办事处工作，游击纵队自浦东渡海来三北建立根据地，苦于缺乏通讯电台，金如山知道陈书荏是行家，不久来信要求设法帮助解决。

记陈书荏支持抗日四件事

马立群

陈书荏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技术很精，早在白衣寺佛教孤儿院，就设有无线电工作研究室，自费置备器材仪器，吸引我们许多爱好者共同学习研究，我们中如陈文来、陈庆章等都学会了装置中短波收音机，进而试装收发机。记得解放前宁波第一个广播电台的机件，也是陈书荏设计安装的，地点忘了，大约是四明药房楼上呼号××频率，后为宁波广播电台取代，停止播音。

宁波沦陷后，日本特务对业余搞无线电的十分敏感，检查极严。我们都停止活动，但留有大批另件。陈书荏收集现成的电子管等仪表、器材，装了二大箱与我二人提着一只藤箱，一只网篮，扮作修钟表、眼镜的小贩，从鄞西百郎桥出发，按金如山来信指定的龙山小学找杨老师，下午四时左右，到达龙山小学。杨老师十分喜欢，叫我们稍休息，吃点饼干，陪同去找总办，天已快黑了，我们路又不熟，到海地戎家找到一个独立大房子，好象是祠堂，时间已是深夜，里面灯烛辉煌，很多人还在工作。金如山出来接待我们，他十分高兴，陪我们吃牛肉粥，这是他们夜餐。我

们中午未吃饭又饿又困赶紧吃完，倒头就睡。次日早起把二箱器材移交完毕，要求见见陈鸣治，知他已担任部队修械厂厂长，金如山因路太远我们又疲劳，不让我们去，只介绍我们见支队长林有章等负责同志，谈话中，林动员我们留下来帮助工作。可是我们觉悟不高，因家属在宁波有许多不便没留下。早餐后，支队派了一个潘参谋带了一班人枪护送。我们再三推辞，还是不行，只好由他们带路，到了龙头场有伪军姚华康部哨位，我们一再请潘参谋回去，他说不要紧，伪军不会干扰的，就这样大模大样走了过去，直送到费市。我们再也不敢叫他往前送了，坚决请潘参谋回去。他说：“奉命送到宁波，这怎么行”。我们写了一张便条，感谢他们已送到了宁波。一俟他们带着武装回去，我们悄悄雇了一艘脚划船，经大西坝回家。

从此以后，金如山的爱人胡彩仙经常来宁波采购文具、印刷用品，就在我家落脚住宿，直到1945年9月部队北撤为止。

连天爆竹声

★ 邵兴健

1945年夏天,当苏联打败法西斯德国的消息传来后,三五支队蒋子瑛指导员曾在庄桥镇东邵村组织召开过一次庆祝大会。

那时我还在东邵小学读书。那天蒋指导员随带警卫员来到我们学校,他要在校里召开一个会议为庆祝大会作准备。为了保证安全,在下午开会前,他要我校张启明老师组织几名小学生到村子周围去“望风”。

会议是在老师办公室内开的。会议开始后,张老师要徐永屏同学和我代表小学生也去出席。

蒋指导员在会上讲了苏联打败法西斯德国的辉煌战绩及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也讲到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正在他讲话时,一位三五支队队员手提步枪突然闯了进来,报告说:“从宁波方向开来一只航船,船上发现有伪军……”。出席会议的人听这

一紧急情况,都恐慌起来。蒋指导员一面叫大家镇定,一面把原来摊在桌上的文件资料塞进皮包背到身上,张老师也帮着他拿来不及收拾的文件资料往墙上照相镜框后面藏。蒋指导员马上拔出佩在腰间的手枪,朝大门口快步走去。我当时因为年纪小,还不知道“危险”两字,出于好奇,也跟着他出去。走到大门边,只见蒋指导员已挺立在大门口,他的一只手靠在背后,手里紧握着手枪。我走到他身边望出去,见门前小河边停靠着一艘航船,一个伪军士兵高举双手站在岸上,他的上身黄衣裳已被扒掉,一位三五支队队员正在他身上搜查。

原来这船上只有一个伪军士兵,是在船上打瞌睡被抓获的。蒋指导员弄清情况后,知道只是一场虚惊,就回来叫大家坐下来继续开会。会上蒋指导员布置大家:晚上各村要组织群众到东邵小学操场参加庆

祝大会。他对我们学校的要求:参加庆祝会时,每位老师须带一只大爆竹,每位小学生须带三只小爆竹。

晚上各村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到我们学校操场,尽管我们村子离镇上只有三里路,当时镇上正驻扎有日本鬼子和伪军,但大家还是冒着风险赶来参加。

庆祝大会开始,当会上宣布:“放爆竹!”我们把带来的大小爆竹一起点燃。刹时间场内天空中到处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闪烁着爆竹爆炸时的火光,它象节日的礼花在人们的心头怒放。

自从日本鬼子打进宁波,老百姓们吃过他们多少苦头。现在苏联打败法西斯德国,群众知道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即将到来。所以当听说要召开庆祝大会,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听!这连天爆竹声,就是我们当年欢乐心情的最好写照。

揭穿敌人假和平阴谋

抗日胜利,浙东我军主力北撤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出军队分三十二路,气势汹汹地对我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疯狂“清剿”。党对反动派的这一手早就预见到,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一方面,我军在北撤时发表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说明我们在群众大力支援下取得了抗战胜利,现在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实行北撤。同时,组织了公开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保护伤员与革命干部家属,以便与敌人开展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党预见到敌人谈判不会有诚意,作了坏的打算,采取了一系列的隐蔽措施:对不能北撤而留下的伤员,会走的发给安家费,让他回家隐蔽,重伤员不能走的,在后方医院由院长、医师、护士留下照顾他们,对有些名气的民主人士,向他们讲明前途,要他们到上海等地去隐蔽。我们党内有刘清扬(后被捕)、陈布衣、朱之光、朱洪山、陈爱中、蒋子璜、项耿、黄连、孙敏儒和我等地县领导干部留下坚持原地斗争,活动方式转入极端隐蔽,党的地下组织由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刘清扬任四明特派员,蒋子璜同志任慈镇县特派员,慈东、慈西、慈城、慈北都属他领导。陈布衣同志任慈姚县特派员,慈南区属他领导,我任慈南区特派员,其余陈爱中同志分工到鄞县,项耿余上,朱光同志到姚南,黄连同志与陈布衣同志一起,朱洪山、孙敏儒两同志搞留守处工作,活动在慈南。对我军北撤时留下的后勤物资,贵重的容易掩藏的掩藏起来,其余半成品制服、医院的一般设备等,就准备让反动派来“劫收”,以麻痹敌人,使根据地群众少吃苦。

敌人为了蒙骗人民群众,推卸发动内战的罪责,当时来接收宁波的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先遣

坚持四明解放斗争的回忆

★
鲍纯甫

纵队司令陈沛,一到宁波,就登《时事公报》和拍电报给我们,要我们三五支队派人去谈判。当然这是敌人要的花招。敌人一面要我们去谈判,一面把挺四(八十八团)开到余姚,把各地伪军变成了“国军”,部署好兵力,要消灭我们。

我们怎么办呢?谈判这个合法斗争还是坚持进行。我们抗战有功,讲得出理;敌人没有诚意,通过谈判可能揭穿它的假面具。同时作好坏打算——反内战。去谈判的人,领导人原定由留守处主任朱洪山去,后来考虑到形势很不好,反动派不讲信义,危险性太大,改叫后方医院政委黄明去。他是独腿的残废人,反动派不好难为他。

黄明到了宁波,双方就开始谈判,但对方毫无诚意。

陈沛首先问:“你们为啥要北撤?”

黄明答:“我们撤退是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上级有命令,根据国共两党中央谈判好的条件,我们从南方八处地方撤退,浙东是其中之一。”

接着,黄明提出要优待伤员、烈属和抗属。

陈沛说:“你们这些人也撤退好了。”

黄明说:“这里到处是你们的军队,要我们撤退,你们要打证明给我们,保证路上通行无阻。”

口说无凭,落笔有据,敌人存心消灭我们,当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接着陈沛又问:“别国共产党没有武装,你们为什么要搞武装?”

黄明反问:“为什么世界上别国共产党能合法存在,我们不能合法?”

陈沛狡辩说:“别国共产党没有武装,所以合法,你们交出军队,也能合法,也有权利了。”

黄明驳斥他说:“我们有军队还没有权,没有军队早就被你们消灭了。”

陈沛被驳倒了,气得呼呼响,转身走了进去。接着,陈沛的秘书进来当“和事老”,他装起笑脸

递给黄明一支烟,说“你们走好了,我们的军队不会难为你们的。只是你们要把十万套制服和弹药库等等物资移交给我们。”

我们原打算把有些东西移交给他们。但是他瞎说一顿,那有这许多东西,以制服来说,只有几千套,我们北撤前共计只一万人左右,那会有十万套制服,而且这数字也不是浙东人民能负担得了的。这次谈判就这样在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的情况下破裂了,但反动派也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了它的假和平真面目。

上 屏 风 山

在谈判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清剿”,到处搜捕我革命志士和有些名气的民主人士,逼迫参加过民兵队、农会的进步群众登记自首。同时,穷凶极恶地搜索我们埋藏下的物资,袁马、杜徐等处原是我们的后勤部所在地,物资多,“敌人”清剿也特别凶。

当时,各地群众看到我们部队走了,都痛哭流涕,依依不舍。纷纷说:抗日胜利了,你们这批介好的人倒都走了。同时由于反动派“清剿”,群众有恐慌情绪。

谈判破裂后,敌人“清剿”更凶了,我们在地方上隐蔽更困难了。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我们十多个同志转移去屏风山隐蔽,伤员无法移动,就留下朱洪山、孙敏儒和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照顾他们。留守处改称团本部,由朱洪山同志任团长,孙敏儒同志任团副。

屏风山,在上虞、余姚、奉化、嵊县四县交界处,纵横数十里,山峦重叠,地形险峻,人口稀少,交通不便。

我们去的时候,共计十七个人,其中有刘清扬、黄连、陈布衣和他的警卫员王长富、俞存朝、俞川流、俞世猛、乐子型和我,还有仙居人一个老王同志,温州的马雪、辛嘉奎、辛道田三同志,支队部姓谢的机要队长。去时每人都轻装,一人只带三斤米,一部电台和五匹马力的马达也带去了,以便和北撤的部队取得联系,得到领导的指示。

我们从余鲍陈后面的白花尖(土名山坑下)山厂出发,第一夜到金竹尖。第二夜到茶山,第三夜又走了一夜,进了深山密林,第四天早晨继续走,到上午十点钟光景,三夜弯弯曲曲共跑了两百多里路。我们终于到达屏风山。

在我们上屏风山路上,我们到那里,敌人也随脚后跟到那里。这不是敌人情报工作好,而是“清剿”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到处都去。好在我们行动神速,敌人无法追上。

到了屏风山,就由谢队长发电报与部队联系。谁知过了一会谢队长说:“与部队联系不上,可能部队去远了,听不到了。”

一听说与领导失去了联系,大家都急煞了。这时候谢队长提出:“我到苏北去找部队。”在没有办法之下,刘清扬同意他去,并与他约好:回到慈南我家来找我联络。收发报机就此埋藏起来,我们只剩下一只三灯短波收音机,可以收新华社电讯,但无法与领导联系了。

上了屏风山,环境比外面是好多了,但也并不安全。我们进山头一天,住在一个现成的笋厂(小草舍)里。考虑到这里不安全,住了一夜,我们又向深山转移。移动时有些六谷拿不过,第二天派俞川流、俞世猛两同志回去拿,谁知他俩到笋厂竟碰到了小白脸土匪部队。

这支土匪部队为啥会跟上我们?原来由于反动派大肆“清剿”,社会秩序混乱,这批土匪部队就乘机抢老百姓东西。这一来,被反动的地方武装梨洲自卫队追击,它只十几个人,打不过,逃进山来。路上发现有茅草眠倒的痕迹——我们进山留下的,他们已饿了一天一夜,看到这痕迹,估计里面有人,有人就可能有粮食,所以跟了进来,川流他们去时,他们正在烧六谷吃。

双方一碰面,土匪就要我们联合去打梨洲自卫队。我们的方针,隐蔽第一,川流他们就婉言拒绝说:“我们人不多,又有伤员要保护,不能去打。”但对方还是纠缠不清,川流他们只得说:“我们去请示了领导再讲。”土匪要跟来,骗说路很远,才把他们阻住了。川流他们回来一谈情况,大家觉得问题很严重:土匪后面还跟着反动的自卫队!负责同志用望远镜向四周一看,好几个山

头上有反动自卫队的瞭望哨。怎样使土匪不跟着我们呢？有人提出去缴土匪的枪。但是考虑后觉得这办法不好，因为根据组织上的决定，我们主要是隐蔽以保存实力，一打就暴露目标，并且不一定能把土匪消灭光。最后商定还是去与土匪部队谈判好，因为一则我军在四明威信很高，现在主力虽已北撤，但人家不知道我们留下有多少人，摆“空城计”吓退土匪很有可能；二则土匪也怕暴露，轻易不会动手动脚。

商定后，由陈布衣同志假扮大队长作代表，俞世猛、辛嘉奎等四个身材魁伟的同志作保镖，陪同前去谈判。结果，土匪果然被吓住了，答应退到别处去。陈布衣同志又对他们进行了前途教育，告诫他们出山去各自安分守己找些事情做，不要再糟害老百姓。

自从遭遇土匪，我们更加提高警惕，随时作好战斗准备，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遭遇。同时，与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作斗争。山上的生活是非常紧张艰苦的，但是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同志们的顽强精神，我们与各种困难进行斗争。

我们进山与外面的同志断绝了联系。大约过了个把月，刘清扬派我和黄连同志到慈南西岙附近一个小村庄（在西岙对上）去联络朱洪山同志。朱洪山同志他们隐蔽在西岙村前一座小山上，山上只有几株小树，他们就隐蔽在小树下。敌人从下面看这座小山，光光的，一眼就能看清，所以不放在心上，而是反来覆去的“清剿”对面大山。

从朱洪山同志那里，我们了解到许多情况：

1、蒋子英同志在去庄桥大袁陈活动时，被敌人包围，敌人逼他投降他誓死不屈，结果被活活烧死在被围的房子里。鄞县吕云洲同志（武工队员）在鄞西大雷乡骑马坡竹山里等联系时，遭到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书记长汪焕章（又名汪焕伯）和鄞县自卫队队长郭东明带领的两百多人的包围，在他四面架起了机枪，要吕云洲同志缴枪，吕云洲同志奋勇突围，一枪就打死了郭东明的警卫员，但子弹少，几枪就打光了，他又甩手榴弹，但不响，结果被敌人机枪扫倒而壮烈牺牲。

2、有些同志被敌人捉去了。袁马支书袁宝

山同志被敌人捉去，逼他讲出我军埋藏物资，他坚决不说，被打成重伤，用三千多斤谷钱才保出来（过了二三个月后他还是因伤重不治而亡）。藏在袁马的印刷机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搜去了。慈南区的民兵大队附、郭姆乡、李思义也被敌人捉去了（他在牢监里表现也坚强，四五个月后因反动派的折磨而死在牢里）。

3、我方的伤员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的迫害。谈判破裂后，八十八团包围了在鄞西晓岭的我军后方医院，把衣服和全部粮食、养护费都抢去，企图饿死我方伤员。周围群众知道后，纷纷送东西来给伤员吃。

国民党匪军抢东西，伤员们愤怒极了，纷纷大骂：“日本鬼子来了你们逃，日本鬼子被我们打走了，你们又横行霸道了。我们抗日受了伤，你们不抚恤，还来抢东西，你们真是土匪！”谁知毫无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竟恼羞成怒，不久就把全部几十名伤员连同医护人员捕到陆埠，并把骂得最凶的六个伤员刺死（后来敌人又杀了我们几个伤员，其余释放出来，死活不管）。

4、与余上特派员项耿同志失去了联系。

5、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重点已由军事方面转向政治方面，敌人的正规部队是减少了，开向了内战前线。但是，军事上的“清剿”活动也还有，四明山附近鄞县、余姚、慈溪、上虞、嵊县、新昌、奉化等七个县都有伪军改编的自卫队。这七县自卫队，每七天进行一次联防——上四明山搜一遍，在此同时，原政治上的“清剿”进一步深入。这时，国民党的乡保政权已经建立，继续逼令参加过农会、民兵队的进步群众“登记自首”，开始建立情报组织，清查户口，搞联保切结。敌人还在梁弄建立四明山绥靖区。

我们回到山上，分析情况进行研究后，为了粉碎敌人政治上的“清剿”，我们在山上与群众联系不便，就决定分头下山继续开展地下斗争，我回到慈南开展活动。这是1945年11月。



我回到慈南时，虽然大规模军事“清剿”已经